

新書

中國近代

23.3
3

B015/24

K823.3

10-3

2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郭 容

岳 山 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

A603869

责任编辑 吴慈生
封面题字 周慧璜

5-8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主编

邹容

岳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字数 37,000

1974年4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2版

198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50,001—266,000

书号 11074·523 定价 (六)0.19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目 录

一、风雷激荡的年代.....	1
二、在风浪中成长.....	8
三、“游海外，留经年”.....	14
四、思想战线上的“马前卒”.....	20
五、《革命军》的出版.....	27
六、《苏报》案.....	37
七、为革命献出青春.....	45
八、《革命军》和革命潮.....	53

一、风雷激荡的年代

当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序幕，中国人民掀起的民主革命激浪，给投靠帝国主义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敲起了丧钟。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是这一时代的号角。他们作为一支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登场。他们热爱祖国，奋不顾身，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等恶魔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自署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就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个。

邹容，小名桂文，又叫威丹、蔚丹、绍陶，四川巴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即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巴县紧临重庆，在清末是重庆府的首县，四境万山重叠，长江上游的急流从这里奔腾东下。在邹容成长的年代，中国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苦痛。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新和旧的斗争，一浪接一浪地翻腾，整个社会在激荡中。

历史上称为“天险”的四川，雄踞祖国的西南。那时，四川虽然还不是帝国主义武装直接逞凶的地区，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传教士，早就深入到了这里。一八七六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常驻重庆；又附专款一条，规定英国还可派员由北京动身，遍历甘肃、青海一带，或由四川入西藏，直达它的殖民地——印度。外国



邹容像

侵略者已将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列入他们的侵略日程。

一八九四年，日本军阀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政府的军队大败，李鸿章吹嘘为“御外侮亦无不足”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结果签订了割地丧权、损失惨重的《马关条约》，台湾被霸占，东北被推向虎口，重庆等地又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此后，作为西南重镇的重庆，也成了外国侵略者的据点。他们在这里辟租界（日本），派领事，驻兵

舰，开洋行，设工厂，盗矿产，测航道，勘铁路，外国商品也上溯长江，大量输入四川。来到四川活动的外国侵略分子，与日俱增。这时，邹容已开始晓事，《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后来在他的论著中，有极为强烈的反映。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中国的处境已惶惶不可终日。帝国主义纷纷租占港湾，掠夺铁路，划分势力范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① 人们警惕地指出，帝国主义之于中国，“譬如春蚕之食叶，边境完而后及于中心”。^② 四川等地，正是这种将被“蚕食”的中心。

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于一八九八年掀起戊戌(wùxū物虚)变法运动，革新和守旧两种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顽固派很快发动政变，反扑过来，杀了维新人士的头，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十九世纪末了的一年，一九〇〇年，中国人民在华北发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声势及于全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而这一年，在长江中游，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后一试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在南方的广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发动了反清的惠州起义。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在积极谋求改变现状，为中华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这时，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竟纠合八国侵略联军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② 《四川》杂志，第二号，第一——二页。

杀进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火海之中,并在南方进行分裂活动。清朝政府则撤去一切民族防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九〇一年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拍卖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它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机构——“洋人的朝廷”,匍匐(pūfū蒲伏)于帝国主义的脚下。

政治上的严重压迫和奴役,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勒索。以邹容的故乡四川为例,还在八十年代,丁宝楨担任四川总督时,他向皇帝奏报说,四川的捐税“正供(指田赋)之外,有按粮津贴,计可得六十万两;津贴不足,则又按粮捐输,计可得八十余万两”;但“率之常年捐输而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两”不敷,又不得不以别的捐输名目取之于民。^① 这些叠床架屋的捐税,已经压得四川人民喘不过气来。而甲午战后几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勒索和清朝政府的巧取豪夺,仅从加在全国人民身上、由各省人民分摊的三个大项目中,就可以看出那种竭泽而渔的情景。这三个大项目,一是一八九七年,清朝政府为归还俄、英、德、法四国借款每年本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规定四川按年分担九十四万两;二是一八九八年,清朝政府为筹还《马关条约》最后一期赔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四川要分担银一百零四万七千余两;三是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规定由各省分担,四川每年要摊付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两。还有种种巧立名目的捐税,和官吏的层层榨取,就更无从计算了。所有这

① 《丁文诚公奏议》,卷一三。

些情况，在邹容的论著中，都作了无情的揭露。

清朝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四川余栋臣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八年两次武装起义，就很有声势。后一次传檄(xí 习)各地，宣布要“驱异族之犬羊”，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响应，震动了川东一带。当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时，四川义和团也四处传布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驱教士，毁教堂，打击了在四川的外国侵略势力和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者。所以，清朝统治者一再惊呼四川民情浮动，日子很不好过。

邹容生长在这个时代，和那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有极大的苦闷。但这个时代和环境，也给了他以磨练的机会。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国历史是更为沉痛的，中国人民的革新尝试和反抗斗争，都失败了。然而，中国人民决不会就此停住自己的脚步。斗争，失败，再斗争，他们遵循着这个逻辑行事，在二十世纪初年展开了新的斗争。

本来，从甲午中日战争时开始，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香港组织兴中会，在广东进行反清的武装起义。但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斗争的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揭起的维新变法旗帜，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却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很多人对他们寄予希望。经过戊戌政变，和国内外反动派对义和团运动的联合镇压，清朝政府腐败和卖国的面目已彻底暴露。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yù 与)权所也。”^①那

① 《醒狮》杂志，第一号，第二页。

是说,再也不用去要求清朝政府搞什么维新变法了,而应采取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可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头目康有为,仍然抱着改良主义的主张不放,在国外组织保皇会,要保救被囚禁了的光绪皇帝,说什么:“皇上之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复位兮,大地莫强”。^① 以中国的兴亡,决定于光绪的能否复位,完全是一派皇权主义的胡言。一九〇三年,康有为在周游欧、美各国之后,又抛出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大弹改良、保皇的滥调,说中国只能搞君主立宪,不能革命,若要革命,就会招致亡国。他的门徒把这封反对革命的长信,标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印发国内外,蛊(gǔ 古)惑人心。因此,是拥清还是反清,是保皇还是革命,就成为中国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劈头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词》一文中,说过一段话:“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旧嬗(shàn 善)代之时也。”不少论著曾经引用这段话,来说明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时,中国所处时代的特征。从形式上看,它表达了那时新旧“相搏相射”的紧迫气氛。但是,梁启超站在保皇的立场上,仍然把改良、变法看作新,仍然以改良、变法,和保守、顽固作为两异性“相搏相射”的对立面,抽掉了革命和改良的“新旧嬗代”,是对革命和改良“短兵相接”这个最富时代特

①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四,第五三六页。

征的新质态的抹煞。

因为，二十世纪初年的新、旧斗争，同十九世纪后期的新、旧斗争，有了不同的内容。不仅原先的保守派是旧的，就是曾经标榜革新的改良派，也正在向旧的转化，包括梁启超自己在内。所以，后来人们称这派人为“老新党”。近代中国是一个激烈变化的社会，新陈代谢特别快，“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①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更是这种激烈变化的年代，波涛汹涌，奔泻千里。人们是迎着变化的时代前进，还是停住自己的脚步，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检验。

年轻的邹容，正是在这个激烈变化的年代里努力学习和积极活动的。他从前一场新、旧斗争的感受中，立即冲向时代的前头，迎接民主革命又一场新、旧斗争，而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一辈的勇敢战士。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六页。

二、在风浪中成长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大量表现为新、旧斗争。人们经常在这种斗争中表演，为这种斗争所考验。新，不是口头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决定于对一切旧制度和旧事物采取什么态度。

学堂和科举之争，即新学和旧学之争，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社会新、旧斗争重要的一环。邹容就是在受教育过程中，从对旧教育的鄙弃，开始斗争的。

邹容六岁开始上私塾，经过几年努力，很快读完了封建教育规定要读的四书五经，并已读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名著。他的父亲邹子璠(fán烦)，经商陇、蜀间，是个颇饶资财的商业资本家。他看到邹容聪明向学，很希望邹容在科举考试上下工夫，一级一级考上去，取得功名，以光大邹家的门第。

邹容十二岁的那年(一八九七)，跟着哥哥一同参加巴县的童子试。童子试就是童生考试，是学做八股文章、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属于童年应试的一级。但是，有许多人多次参加这种考试，没有考上，考到长了大把胡子，仍然叫做童生。不过人们给他们添上一个“老”字，呼之为“老童生”。

就算考得顺利，也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多场考试，场场中试，才能考上一个秀才。然后考举人，考进士，逐级应试。不知有多少人，被这种无用的八股文，考掉了青春和生命。

邹容在临试时，对词意晦涩的题目不甚了然，要求主考官解释，被拒绝。他当场同主考官顶撞，愤而退出考场。他第一次参加考试，就和这种束缚思想的八股考试制度发生了冲突。

这时，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维新之风，已由北京、上海和广东、湖南等地，吹到了巴山蜀水。邹容得以接触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梁启超等主编的《时务报》一类著名的维新书刊，四川也在这种风气中，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时代的启示，思潮的奔泻，促使革新要求很快在邹容的思想深处发了芽。当他父亲一再以认真赶考的话向他说教时，他坦然回答道：“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表明了年轻一代正在和旧制度决裂，向老一辈挑战。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深处内地的四川也岌岌可危，中国已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而在清朝统治下，整个社会仍然是那样闭塞落后。邹容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要知道中国，更要开眼看世界，向世界寻求知识。于是便同一些青年，跟来到重庆的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学习西学。他在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渐渐懂得国内外的大事，写起文章来，发挥议论，日有新意。在谈论时事时，他对那些腐朽的冬烘先生，不问其身份如何，常当面加以驳斥。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人士有的被杀，有的被放逐，有的流亡。消息传来，邹容大为激动。然而使他特别激动的，不是死难“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杨锐和刘光第这一类官员，而是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湖南人谭嗣同。他无所畏惧地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在上面题了这样一首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诗的技巧虽不算成熟，但是，他这个仅有十四岁的少年，就如此满怀斗志，鲜明地表达了对新、旧事物的爱憎，并且呼唤“后来者”，特别是勉励他自己立志走革新的道路。他的诗，是时代的脚步声。

其时或略后，邹容就读于重庆经学书院。旧时书院院长称作山长，经学书院的山长吕翼文，是个搞训诂考据的学者，尊古重道。邹容不顾那里的清规戒律，常常和同学们热烈地辩论。辩论起来，“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

尧、舜是古代传说中中国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以实行“禅让”制度受到后世称颂。周公是西周的大政治家，以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制定《周礼》著名。孔子是春秋时的大思想家和学者。在传统的封建说教中，尧、舜是神圣的君主，周公、孔子是圣人，从尧、舜至周公、孔子，以迄孟子、朱熹，被视为一脉相承的封建道统的代表。邹容对千百年来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被尊奉的这些巨大偶像，竟无所回避地给以非议和蔑视。他怎样“非”、怎样“薄”的话虽没有留传下来，但词锋所向，惊世骇俗，是无可置疑的。

一九〇〇年，邹容又为反对科场舞弊发生楼外楼事件。

这年重庆举行府试，知府鄂芳的幕僚有个义子，品学均劣，居然名列前茅。榜发，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去摸老虎屁股。邹容闻悉，大为不平，一天，在五福宫的楼外楼见到那个幕僚的义子在楼上喝酒，便隔窗对着大骂，醉眼蒙眬的义子听到骂声，却没有认出人来。几天后，邹容又寻至义子住地厉声道：那天在楼外楼骂你的，就是我姓邹的，你知道吗？赶快说出你干爸爸帮你干了些什么鬼花样？义子理亏无奈，奔诉于义父，义父向鄂芳控告，鄂芳派衙役把邹容抓来。邹容面对知府大人，直认不讳，并说你们徇私舞弊，我何以骂不得？鄂芳恼羞成怒，喝令衙役打了邹容二十记手心。邹容愤愤而去。

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猛烈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冲来。以西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迫于大势，见风使舵，居然想把“维新”的旗号接过去。一九〇一年一月，发出要“刷新政治”的诏书，叫喊“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在这种所谓“维新”的推动下，当年夏天，四川总督奎(kuí)俊效法其他省份，宣布要选派二十二名^①青年去日本留学，在成都招考。邹容得到消息，很高兴，认为这是到外国学习革新本领的好机会，请求父亲准许他去报考。思想保守的舅父刘华廷从中阻挠，说是让年少倔强的邹容远离家门，跑到外国去，将会闯出大祸来。邹子

① 不少书和文章都作二十名，根据奎俊：《奏派学生赴日本肄业片》（见一九〇五年《四川学报》，第二册，奏议栏）订正。

璠犹豫了。邹容知道这个缘故，拿起菜刀要同舅父拚命。他的继母从中劝解，邹子璠只好同意他去。邹容仍愤愤不平，在他给大哥的信中说：“彼（指舅父）挟其成老谋国之见，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①七月一日（阴历五月十六日）邹容步行千里，从重庆去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考的成绩并不坏。由于他愤世嫉俗，思想激进，得罪了一些守旧的人，这些人就向官厅说邹容的坏话，其中一个就是后来颇有点名气的立宪派分子周善培。官厅因此取消了邹容的录取资格。

年轻的邹容，虽然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一点也不气馁，上进心更坚，打定主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八月二十日（阴历七月初七日），他由成都回到重庆，经过向父亲多次争取，几至决裂，最后得到父亲的允许去日本留学。邹容并在给大哥的信中，指出“科举路从此绝矣”，要他致力于“崇实致用之学”^②。

就在当年十月，邹容踏上了他不平凡的征途。从重庆乘船下驶，穿过三峡。湍急的江流冲打着两岸的岩壁和江心的礁石，一簇簇浪花，一圈圈漩涡，映入邹容的眼帘。他的思潮也同江流一样翻滚。现在，他摆脱了家庭和亲族的束缚，冲出了封建教育的牢笼，风帆高挂，大江东去。祖国的万里河山，世界的动荡风云，正把他引向远方。

邹容以上海作为他去日本的第一站。到了上海，为去

① 《邹容家书》二，原件存重庆市博物馆。

② 《邹容家书》一，原件存重庆市博物馆。